

燕巢之恋

我在燕园住过的几所院宅

谢冕

有诗曰：“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应该是此地当日风景。

我人住朗润园不久，吴组缃和陈贻焮两位先生也成了我的邻居。不过，他们的住房比我宽敞，是独住一个单元。与我比邻的，还有季羨林、金克木、季镇淮等先生。他们和我一样住的是新盖的公寓。令我特别羡慕的有两家住房，一家是温德先生，美国人，单身，终生都住燕园。温德先生家是一个半四合院，温住正房，厢房住着中国佣人一家。温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营养学家，他在院里种了许多鲜花和蔬菜。温先生九十岁还骑自行车，还能在游泳池仰泳。

另一家则更美，是孙楷第先生家。前面我说过朗润园是一个岛，孙家更绝，独占了一个岛中之岛。几间平房，前后树林，亦是四面环水，宁静如村居，有小木桥通达。上世纪某个年代，消息传来，现任教授可以自费修缮入住，我和一位同事，曾动念两家合资修缮此岛，终未如愿。梦想成真的，倒是后来我主持北大诗歌研究院，在当时校长周其凤和校友骆英的全力支持下，在濒临孙楷第小岛左近，盖了作为诗歌研究院办公场所的采薇阁。我为此写过《采薇阁记》，并以石铭之。

蔚秀园听十里蛙鸣

燕园是北大现今校园的通称，它的基本版图是原先燕京大学的校园旧址。当年司徒雷登校长为建校多方奔走，筹集资金，斯园始成，令人铭感。北大入驻燕园之后，燕大原先的规模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于是有了在附近园区寻“空地”建房的思路。朗润园沿湖的楼群即是开端。事情到了七八十年代，这种思路就延展到了此刻的蔚秀园，也包括嗣后的镜春园和承泽园。一切也如朗润园一样，在湖边找“空地”建房。这样一来，原有的园林格局毁坏无存，而受益的却是我们这些渴求“蜗居”者。

蔚秀园原先的主人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非一般的人。此园正对着如今北大的西校门，中间隔着当日由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如今也是由北京城里去往北大、清华、颐和园和香山必经之途。蔚秀园呈现的也是一派旧日皇家园林的气象，它的特点是在当日京畿的郊野造出迷人的水乡烟景。园内溪流婉转，有山，山间有亭；有水，水上有桥；有岛，岛上绿树环绕，村居隐然其中。

为了盖楼，砍树，修路，毁弃稻田，填塞河道。顷刻之间，蔚秀之风光几尽丧失。记得当年，我们步行出游圆明园，往往出西校门穿越蔚秀园。田间道旁，苇荡摇曳，薰荷凝香，稻田夹岸，让人仿佛回到了遥远的江南。当时盖楼，为了扩展面积，将原先的河道改为水泥暗沟，偶尔还能见到贪玩的野鸭“偷渡”暗沟的身影，见此，掩不住的心酸，它们是在寻找失去的家园吗？

但当时在我，却是另一番心情。日盼，夜想，终于盼到了在燕园有自己独立住房的日子。蔚秀园二十一公寓顶层五楼，一个小两居成了我的新家。新居有一个简易的卫生间，没有客厅，中间过道可置一小桌，用以餐饮和接待朋友。我终于告别了三家三代人“拼居”的朗润园，开始了安适的、也是宁静的教师生活。在蔚秀园，我带研究生，教学，研究，写文章。一些有限的学术成果都得益于这个相对平静的环境。蔚秀园五楼有一个可供晾衣的小小的凉台，由此可以眺望当时还是一片稻田的畅春园。那一片稻田属于海淀西苑乡，是著名的京西稻的产地。高楼明月，夜景凄迷，蛙鸣起于四野。从午夜到拂晓，此起彼伏，可谓彻夜狂欢。蛙唱扰人清梦，当年烦恼莫名，如今却成绝唱，思之惘然！

畅春园最后一方稻田

我宅居燕园的最后一站是畅春园，这是我的户口本注明的迁移地。畅春园是康熙驻蹕郊外避喧理政之所，它的历史早于圆明园，更早于颐和园。从遗存的绘图看，园区起于现今北大西门，一路南向铺展，直抵现今的海淀、苏州街、稻香园、芙蓉里一带。全园山水连绵，亭台楼阁，湖区别以花堤连接，极一时之胜。史载，康熙曾在此延请外国老师讲授，研读天文、地理及算术等。这些前朝盛事，如今已被遮天蔽日的楼群所埋没，只剩下屹立于北大西门的两座畅春园已废寺庙的山门，坚守着数百年的寂寞。

畅春园的居住条件好于以往的几处住房，三室一厅，独门独院，只是面积仍然偏小，可用面积才五十多平方米。我住一楼，有一小花园，园内种了两棵石榴，沿墙植竹，另有凌霄花爬满篱笆。我在此度过八十年代最后的时光，在此迎接了九十年代。北大的畅春园区，即是康熙旧日的住所。应该说，我不慎踩了皇家的地面。印象深刻的是紧挨着院墙的那一方水田。水田面积不大，似乎是有意的“留存”，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生产朝廷食用的贡米——著名的京西稻。稻田平时不见耕者，每隔些时，便有穿着草鞋、戴着遮阳帽、骑着摩托的人前来“打理”。这些人心知肚明：这是最后一方水田！他们不想挽留，也不能挽留。令人心痛的最后的一方水田，最后的一代“种田人”。

2021年1月6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筒子楼“万家灯火”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落脚燕园，不觉已过了一个多甲子。其间有五年时间住学生宿舍，分别是十三斋、十六斋、二十九斋、三十二斋。当年北大宿舍都叫斋，斋者，书斋之谓也，这称呼很雅致，听起来仿佛飘着淡淡的书香。后来，斋统统改成楼。这一改，原先的一点文气消失殆尽了。与此同时改名的，还有燕京大学初建时命名的湖边七斋。这七斋，分别是德、才、均、备、体、健、全。后来这些斋，也通通变成了“楼”——红一楼、红二楼，一列数字排列下去。

所幸燕园周遭的那些前朝留下的园林，除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短暂的“新命名”，大抵还是保留了原有的园名。因为我在北大工作的时间长了，许多旧园，也都住过，也都是沿袭旧名。需要解释的是，前述的斋中，多数都是学生宿舍，唯有十六斋例外，是改造了用以接纳新工作人员的“婚房”。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大发展，新职工结婚后没有住房，临时改学生宿舍予以安置。十六斋即其中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刚毕业，结婚，生子，没有家属宿舍，也在这里“筑巢”。十六斋二楼的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间，成了我在北大最先的家属房。

十六斋位于校中心著名的三角地。楼三层，一家一间，平均分配。没有厨房，也没有单独的卫生间。楼道即是厨房，那时都烧煤，各家门前安放各自的煤球炉、煤饼、厨具、拖把等等，也都在门边安家。每个楼层有一间“公厕”，校方规定，一、三层为男厕，女厕在二层。那时条件如此，大家都很满意，因为毕竟有了一个“窝”。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当时却是寻常。记得当时成为邻居的，有校工厂的工人，有校医院的医生护士，更多的，则是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依稀记得，罗蒙才、沙健孙，可能还有王选，都住过。

楼道成了厨房，早晚生火，烟熏火燎，菜香飘扬，甚是热闹。邻居久了，彼此熟悉，南方人北方人，口味相异，各做各的，每日似乎都在进行厨艺比赛。时有美食，亦曾彼此分享。葱蒜油盐，缺了互通，如同一家。居间狭窄，互谅互让，少有齟齬，毕竟是读书人。这样的日子，有好多年。我的儿子谢冕在此诞生，当时妻子在读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要做学业，更请不起保姆，就把岳母请来照看孩子，一间房竟住进了三代人！一晃，也是三四年。苦是苦，也有难得的欢愉。

朗润园旧日烟景

我有属于自己的宿舍是六十年代中叶的事。那时，沿朗润园湖岸盖起了六七栋宿舍楼。楼高四层，分配我住的是十二公寓二层一间房。一个单元共四间房，一下子住进了三家人：化学系一家三代人，住一个较大的套间；我们已有孩子，住朝阳的一间；地球物理系一对年轻夫妇，住朝北的一间。一个单元总共约五十平方米，共用一个厨房，共用一个厕所，记得有一个没有热水的淋浴设备，也是三家共用。这次乔迁，我们终于告别了“万家灯火”的筒子楼。虽然依然窄狭，做饭、洗浴，特别是如厕，都要“排队”，邻居一个小孩，喜欢在厕所“引吭高歌”，我们也要耐心等待。困难，却总算是有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空间了。

朗润园位于燕园北，属于后湖地区，是前清旧园。山间有亭，也是旧物，记得还有恭亲王奕訢的题额，这里有皇家贵戚的别业，亭台楼阁，皇家气派，特别是临水的美人靠，让人喜悦。朗润园是一座四水环绕的岛，西山那边的水流经挂甲屯，注入朗润园，这一带因之顿现湖光山色的美景。明人米万钟

父亲八十八岁生日那天，我从蒙特利尔通过越洋电话给他下达了一道“死命令”。我的情绪有点激动，我的语气非常严肃。而居住在深圳的父亲还没有等我说完“死命令”的全部要求就开心地笑了起来。他毫不犹豫地“保证”完成任务，就像在地球另一侧下达命令的是当年站在他面前的部队首长。

像许多性格外向的男人一样，父亲好说大话。他对自己的儿子也从来就只报喜不报忧，甚至躺在病床上也要坚称自己“其实”没有病，这毫不犹豫的保证当然不可能令我安心。称赞了一番他的乐观之后，我继续用严肃的语气说，如此艰巨的任务，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保证”能够完成。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想给他泼冷水，而是想让他知道我不是在玩玩笑。接着，我要求他客观地分析一下自己目前身体状况，然后合理地制定出与自己相应的行动方案。最后我还特别强调说，执行“死命令”的过程中，他可以不惜代价，甚至也可以不择手段，却绝不能弄虚作假。父亲显然知道我这样强调针对的就是他好说大话的毛病。他尴尬地笑了笑，接着向我做出了更大的保证，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我给父亲下达的“死命令”其实是关于“不死”的命令；我命令他“必须”活到九十岁。这对任何一个年届八十八岁的老人当然都是不太切合实际的要求，更何况对我父亲。与同龄的老人相比，父亲的健康状况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他的头脑还比较清楚，但行动却已经不能完全自理。严禁“弄虚作假”当然更增加了任务的难度。我的意思是：他不能像从前那样用“虚岁”来自欺和欺人，而“必须”再活两年，活到“满”九十岁的那一天。

父亲出生于1932年1月25日。这个数字会让细心的读者马上理解我当时的语气和情绪。父亲的八十八岁是在2020年，而他生日的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我早就注意到了这吉祥的巧合。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如果不是正在创作40万字之长篇小说《“李天王”与1979》，我这一天肯定会回到深圳，陪在他的身边，与他一起分享生命的喜悦。

可是，谁又能想到伴随这吉祥而来竟是一连串的不祥呢？！父亲八十八岁生日这一天，武汉的封城已经进入第二天，深圳的首个病例也已经出现，而到最后一刻，家人也不得不取消我遥控为他安排好的生日聚会……这一连串不祥的巧合让我在万里之遥的异乡产生了一连串不祥的疑问：行动已经不能完全自理的父亲是否能够顺利地度过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困难？天各一方的父子是否能够再一次相见？而哪怕答案是肯定的，那再一次相见又要等到何年何月？……所以，我“必须”给他下达那一道“死命令”。所以，我的语气非常严肃，情绪有点激动。

那天刚放下电话，“爸爸八十八”这一行文字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不仅是合情和应景的随笔题目，又是悦目和动听的字组合。它让我产生了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父亲的文章的冲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冲动。我甚至相信这是一篇“必须”写出的文章，为了父亲，为了自己，为了所有那些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巧合，也为了我们遥遥无期的再一次相见。我决定等3月中旬完成自己有生以来最庞大的文学工程之后马上动笔。没有想到，人算再一次不如天算。3月中旬，疫情在北美疯狂地蔓延起来，蒙特利尔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沦陷。刚走出虚构的迷官就陷入现实的绝境！我对此既无心理上的准备，又无物资上的储备，而且我的身体也已经被漫长的虚构拖垮，已经难以灵敏地应对现实的魔幻。一句话，我已经自顾不暇了。那奇妙的汉字组合经常从我的脑海里闪过，可是我已经没有作文的余力，更不要说审美

爸爸八十八

薛忆尧

的雅兴……就这样，将近九个月的时间又变成了过去。

这是不可思议的九个月。这是我一生中受乡愁困扰的九个月。大概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就迷上了西方古典音乐，随后是对它长达四十年的情有独钟。而最近的这九个月，从我的音响里反复传出的却是《渔舟唱晚》和《二泉映月》……听着听着听着，那无家可归的伤感和与世隔绝的孤寂经常会将时间隧道里最隐蔽的往事带到我的眼前。

其中包括许多与父亲相处的往事……比如八岁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因为在课堂上与语文老师顶嘴，我被她推出了教室。她责令我马上去将家长找来看看她。回到家里，我叫醒正在酣睡的父亲。他刚从偏远的干校回省城长沙来探亲，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旅途的疲劳。我已经不记得父亲坐起来的时候含糊地说了一些什么，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对我极度的失望，那感觉至今还令我不安。

又比如十七岁那年的夏天，高考刚结束，我就去与当时任职于益阳地区经委的父亲团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父亲接到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得知了我的优秀高考成绩。匆匆放下电话后，他什么也没有说，而是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停地高喊着“乌拉乌拉乌拉”，如同获得大捷的苏联红军。那是他一生中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天真的表现。在那个时刻，我感觉他就像是我的兄长甚至挚友。那感觉至今还令我兴奋。

还有1983年12月18日的夜晚，本应该在北京的大学教室里自习的我，突然出现在长沙的家门口。我冲动地说我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大学的生活了，

决定要退学回家。在当天的日记里，我留下这样的记载“……没有惊奇……没有责任……只有我从噩梦中惊醒后滴下的眼泪”。这两个反常的“没有”应该足以让读者想象出当时我家里紧张的氣氛。这种气氛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的夜晚。第二天夜里，我平静地告诉父母，经过这一整天的思考，我还是决定返回学校去完成自己的学业。听完我的决定，一整天都没有说过话的父亲突然冲进厨房，失声痛哭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哭声，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脆弱。那感觉至今还令我不寒而栗……

值得庆幸的是，父亲顺利地度过了他八十八岁生日以来的这十个月。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无疑都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日子。而我行动已经不能完全自理的父亲还承受着另一种巨大的压力：他“必须”活到九十岁。这是远在万里之遥的儿子给他下达的“死命令”。这恐怕也是自己的儿子对他提出过的最过分的要求。因为这一道“死命令”，他们饱经风霜的父子关系恐怕又要面临着场新考验。

在我看来，父子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其中经常包括人与人之间最绝情的对抗，也经常包括人与人之间最深情的和解。现在，我自己早已超过父亲第一次在我面前失声痛哭的年纪，也早已有过在自己儿子面前失声痛哭的经历，对父子关系的复杂程度已经有全面的认识。做一个儿子的父亲本来就非常非常，更不要说做一个作家儿子的父亲！因为作家有特殊的观察力、特殊的记忆力和特殊的创造力，会在自己父亲的人生中看到也许不应该被一个儿子看到的瑕疵。他会记住那些也许不应该被一个儿子记住的瑕疵。更可怕的是，将来的某一天，他有可能将这些瑕疵诉诸文字，让自己的父亲接受阅读的“审判”（卡夫卡就是最经典的先例）……

在这饱受乡愁困扰的九个月里，整理旧物成为我的一种心理治疗。有一天，我意外地翻到了父亲刚穿上军装时拍下的那张照片。1948年底，正在许昌城里读高中的父亲突然决定弃学从军，投身革命（我现在怀疑，那个未成年的少年当时就是仗着自己高挑的身材，以“虚岁”报名而获得了信任）。1949年夏天，仍然未成年的父亲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总部南下进入长沙，并且最后就在那里转业成家、生儿育女。

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弃学从军并且离家出走当然是对自己父亲的巨大冒犯。毫无疑问，在他父亲的眼里，我父亲是一个不听话和不孝顺的儿子。但是，看着照片里那个脸上还透着稚气的年轻战士，我忍不住感叹，那“不孝顺”正好是对历史的顺应，而那“不听话”也正好是对命运的听从。

我最近一次和父亲通电话，他的情绪相当积极，他的语气也相当乐观。我说起了他刚穿上军装时的那张留影，也说了他当年的“不听话”和“不孝顺”……说到最后，我发出了深深的感叹。“人一辈子其实只要做出过一个正确的决定就足够了。”这听上去像是一句大话，其实却是关于人生和命运的大实话。父亲立刻就明白了我这是对他的褒奖。他得意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非常饱满，也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将这充满信心 and 希望的笑声当成了他再一次向我做出的“保证”。这是最可靠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我对父亲能够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也对我们能够再一次相见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2020年12月5日



笔会

静 谧
(国画)
黄安群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岁月随人好

谭 然

这副对联中每个字都很普通，也很平凡，没有什么生僻字，也没有典故。大概小学生都认识，会写，能理解。当然金庸先生分析评点的也精彩，讲的明明白白。我后来把这副对联抄在笔记本上，时常在过年的时候写出来当作春联。我从小受长辈教导，恪守传统习俗那一套，尤其是过年这样的重要节日，写字要用浓墨，只求黑亮。字体用方方正正，一笔一画横平竖直不可苟且，内容一定挑吉祥话，一团和气上上大吉。有时候很奇怪，明明理解不了那些古书里的典故是什么意思，可只要那些字在红纸上组合起来，一眼看过去也会让人满心欢喜，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中国汉字有这个效果，我百试不爽，大概仓颉造字是有些道理的。

画画也一样，年节悬挂的作品大多是清供，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只要能烘托出喜庆的气氛，祈求家人内心的安宁，一定要讨个口彩。无论是各种五颜六色的花卉，鲜艳

好吃的水果，憨态可掬的胖娃娃抱着大鲤鱼，代表祥瑞的仙鹤、梅花鹿，总之看起来一切能让人喜笑颜开的物件都能入画。中国人不喜欢把凶神恶煞挂在家里，即使神武威严的门神也只能贴在大门上对着外面，家里只能是三星高照，求的一定是天官赐福。

选堂先生那副对联是一九八四年春节所作，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与时事暗合。金庸先生顺水推舟，加以发挥。一晃三个鼠年过去了，两位有大学问的人都已先后驾归道山，这样好看的文字格外让人怀念。

岁月轮回，我们谁也无法阻止时间的步伐。这么难过的一年也已经消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还有新的一年在等待我们。虽然不知道今年会怎样，但是我们依旧画吉祥的画，写吉祥的字，固然只是寄托，就像金庸先生说的那样，岁月本身无所谓好不好，人好，岁月自然也就好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在总结这365天和人事。谁都想不到2020年竟会这么糟糕，说快也快，说慢也慢，感觉闹地一下一年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想法，多的是一份感慨和歉疚，少了一点喜悦和激动。有对岁月的不舍，也有对未来的期望。

写字画画的人总想在这个时候表达点什么，我想起香港饶选堂先生三十多年前写过一对五言联语：“岁月随人好，山河照眼明”，金庸先生评价说：“联好，字也好。联语中强调主观意境。岁月本身无所谓好不好，人好，岁月自然也就好了。有人看出来山河一片光明，如果对什么都持悲观态度，看出来的山河不免是一片黯淡……至于别人好不好，对我们好不好，现在虽好将来是否仍然好，那非我们所能控制，既然无能为力，不妨置之度外，任其自然。在最可能的情况下，只要我们自己好，大概岁月总也会是好的。”